

唐代太原西北通單于都護府及河上三城道

嚴耕望

太原自見史以來，為北方軍事重鎮。唐起太原，建為北都，更在政治上居有特殊地位。唐代北方強鄰，先後有突厥與回紇，北敵南侵與中國防禦之重點有四，自東而西數之：曰幽州（今北京），置范陽節度使；曰太原府（今晉源），置河東節度使；曰靈州（今靈武西南），置朔方節度使；曰涼州（今武威），置河西節度使；皆為大軍鎮，亦為中國通北疆之主要交通中心。而靈州與太原府，位居中間，為國都長安之屏障，故在軍事上尤其重要，亦為南北國際交通之兩條主要幹線。

回紇舊都在娑陵水上，其水即今外蒙古北境之色稜格河。其後，牙帳南徙於烏德健山與昆河之間，在今和林（西庫倫）之北偏西蓋不到五十哩，鄂爾渾河（Orkhon）左岸之黑城子（Kharabalgasun）。其至唐之主道係由該城東南行凡一千五百里至鷓鴣泉，又南入高闕（河套西北狼山山脈中）凡三百里至西受降城，其地在北河（今黃河故道即五加河）西岸。由此直南取靈州（今靈武縣）道至長安約二千一二百里，由此東取單于都護府（後置振武軍），又東南入雁門關經太原府至長安約近三千里。雁門、太原道雖較迂遠，然太原以南途程平坦，且經濟繁榮，其北亦頗富庶，故沿途供應較易；靈州道雖較逕捷，然靈州以南有橫山山脈之阻，途程艱險且人煙稀少，其北更屬沙漠地帶，故沿途供應困難；是以唐代前期，兩道行程各有優劣。及安史亂後，吐蕃強盛，侵據原州（今固原縣），屢擾鹽、夏（橫山山脈北麓），北侵西城，致靈州南至長安之道不能暢通，北至西城之道亦受威脅；故唐與回紇之主要通道，惟存太原一線，即由西受降城東經天德軍（約今烏蘭鄂博）、中受降城（今包頭之西，黃河北岸）、東受降城（今托克托稍西黃河北岸）及勝州（今托克托西約三十里黃河南岸十二連城），單于府、振武軍（今歸綏，即呼和浩特西南三四十里），又東南取定襄古道經朔州（今朔縣）入雁門關至太原府，循汾水河谷至河中府（今永濟縣）折西至長安。凡使節往還，商賈行旅，莫不由之。若河上有軍事行動，恆以天德軍、三受降城為前線據點，以振武軍為支援基地，西控天德與三城，而太原又為振武之支援基地也。故此時太原在北疆軍事上與國際交通上，尤居最主要地位。故至晚唐，太原以北至振武軍或以西，仍置驛。太原西南通國都長安之驛道交通已詳《唐代長安太原道驛程考》¹；西受降城西北出高闕至鷓鴣泉，又一千五百里至回紇牙帳之國際交通線，另詳《唐通回紇諸道考》；本文主要工作乃就太原府北出雁門關西北通單于都護府更西循河至三受降城之通道作詳密研究。

《寰宇記》錄北朝人所撰《入塞圖》與《冀州圖》皆有太原西北出塞之途程。《入塞

¹ 《唐代長安太原道驛程考》，刊《新亞學報》第十卷第一期上冊，1971。

圖》云：「從晉陽(即太原)西北行百八十里至新興(今忻縣)，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馬邑(今朔縣)，又東北行二百五十里至平城(今大同)。」「從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雲中(今歸綏、呼和浩特西南)，又西北行(脫二百)五十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約東經108°30′，北緯41°30′)，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關(在今狼山山脈中約東經107°25′，北緯41°20′)，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自晉陽至瀚海有此路。」《冀州圖》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今代縣)、馬邑(今朔縣)、雲中(今歸綏西南)，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單于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也。」

按此兩條見《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目青坡道條引。觀其地名，皆為北朝圖籍。《入塞圖》尚記平城東北行之道，《冀州圖》尚有東道發中山出遼西及西道發隴西出敦煌兩道，皆不錄。

諸地名之今地，皆詳後文。沃野鎮為北魏六鎮之自西第一鎮。《元和志》四天德軍目云：「沃野故城在軍城北六十里，即是後魏時六鎮從西第一鎮也。」按天德軍城在今烏蘭鄂博地區，已詳《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程考》。² 則沃野故城當在今烏蘭鄂博稍北，參以上文所引《入塞圖》西至高關二百五十里之言，地望亦略合，然則準以今圖，其經緯度略可知也。

按此為今存最早而有系統之交通史料，至可寶貴。觀此兩條所述路線方向略同，惟《入塞圖》所記，由馬邑東北至平城，始折向西至雲中；《冀州圖》所記，由馬邑直至雲中，無平城一轉耳。觀中古出師途徑，馬邑固可直向西北至古雲中，不必繞經平城。唐代史料所見，朔州(即馬邑)向西北出至單于都護府(即古雲中地)尤為主道。蓋唐代北方強敵先突厥，後回紇，對於中國之壓力，主要在河套地區，不在太原正北之大同地區也。其行程大略如次：

太原府正北行一百八十里至忻州(今縣)，又一百六十里至代州(今縣)，又西北一百二十里至朔州(今縣)，又西北三百五十里至單于都護府，即振武軍(今歸綏、呼和浩特西南約三四十里，東經111°30′，北緯40°40′)，又西南一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今托克托西約十里黃河北岸)及勝州(今托克托西約二十餘里黃河南岸十二連城，東經111°北緯40°15′)。又由朔州直西北四百二十里亦至勝州。勝州又西微北約三百里至中受降城，即安北都護府(約今包頭西昆都倫河口之西賈格爾旗廟，約東經109°20′)，又西北二百里至天德軍(約今烏蘭鄂博，東經108°30′，北緯41°20′)，又西一百八十里至西受降城，其地在北河(今五加河，即黃河故道)西岸(今狼山縣西北狼山東南麓約東經107°10′，北緯41°10′或東經107°20′，北緯41°15′)。又西北出高關塞(今狼山山脈之一谷口經緯度詳前)三百里至鸛鶉泉。

² 《唐代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考》，刊本學報第六卷第一期，1973。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忻州目云：

「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門西界，又三十里至朔門〔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單于都護府，號振武軍，又西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護府、至〔中〕受降城，（原注：『在黃河北拂雲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軍，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三百里至鷓鴣泉。」

按此所記全為唐代州府軍城，北宋始終未入版圖，是必承抄唐代紀錄無疑。按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此條第二「朔門」即「朔州」之譌；又忻州至朔州不只百二十里，此間必有奪譌。然由太原北出忻州西北經朔州至單于府，則無疑也。由單于府而西所歷軍城至鷓鴣泉，正是唐代此道西北通回紇之大道。今檢《元和志》所記太原、忻、代、朔、單于五府州去長安、洛陽之里程及鄰州府間相去之里程，列表如下。《寰宇記》所記，以圓括弧（ ）識之，《通典》所記，以方括弧〔 〕識之。

	單于府	朔州	代州	忻州	太原府
至長安里數	取太原路 1,920 (1,930) 〔2,250〕	1,720 (1,720) 〔1,770〕	1,600 (1,600) 〔1,640〕	1,440 (1,440) 〔1,480〕	1,260 (1,600) 〔1,300〕
至洛陽里數	1,700 (1,700) 〔2,000〕	1,350 (1,350) 〔1,340〕	1,230 (1,330) 〔1,320〕	1,070 (1,700) 〔1,060〕	890 (890) 〔885〕
鄰州相距里數	350 350 (357) 〔350〕	120 (120,224) 〔120,140〕	160 (110) 〔250〕	180 180 (180,180) 〔180,180〕	

此表府州排列，自左至右，即自北至南之順序，觀此數據。《元和志》所記最為齊整，《寰宇記》大同，惟偶有譌字。《通典》亦略同。據《元和志》，自朔州以南，兩鄰接州府間之里距，即為此兩州府去長安里數之差，去洛陽里數之差亦大同，可知朔、代、忻、太原為一大道通兩京者。惟單于府與朔州間相距三百五十里，準確里程為三百五十七里，³ 而此兩府州去長安之差僅二百里，是不相合。按《元和志》、《寰宇記》記單于府去長安路程明云「取太原路」，則經朔州為最近捷之途徑，觀地圖，單于府至朔州決不只二百里。今審視上表朔州以南，各州至長

³ 《寰宇記》五一，朔州「北至單于大都護府三百五十七里。」下文又云，「廢單于都護府在州西北三百五十七里。」此蓋為準確里數，《通典》、《元和志》取其大數耳。

安與至洛陽之差皆為三百七十里。《元和志》、《寰宇記》記單于府至洛陽皆為一千七百里，則去長安應為二千零七十里；如此則與朔州去長安之差亦正為三百五十里，故知諸書記單于府至長安之里數皆誤，而其去太原、長安、洛陽亦實經朔、代、忻至太原也。綱文里數有與《武經總要》異者，皆據《元和志》、《寰宇記》以正之。至於單于府以西之行程及朔州、勝州間之行程，皆詳後文或另文。又由天德軍蓋略循大同川（約今海流圖河）北行六十里至北魏沃野鎮故城，又北行踰陰山約二百四十里至木刺山可敦城，亦當磧口；天寶間曾置橫塞軍，移置安北都護府於此。其地約在今烏拉特中旗黑沙圖地區（約東經 $108^{\circ}10'$ ，北緯 $41^{\circ}50'$ ）。由此西行，當亦至鷓鴣泉。

此節詳拙作《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⁴又《新唐志》錄賈耽入四夷七道，其第四由中受降城通回鶻道實際與此略同。將另撰《唐通回鶻諸道考》，以詳之。鷓鴣泉在西受降城西北三百里，大磧之南，為唐入回紇主道之道口，亦稱磧口，其地約在今貢噶泉地區（約東經 $106^{\circ}10'$ ，北緯 $41^{\circ}40'$ ）；由此西北行一千五百里至回紇牙帳，其地在今西庫倫（Erdeniijo）北約五十哩鄂爾渾河（Orkhon）左岸之黑城子（Kharabalgasun，約東經 $102^{\circ}30'$ ，北緯 $47^{\circ}30'$ ）。

上文引《武經總要》，西受降城又三百里至鷓鴣泉。按《元和志》四，西受降城「北至磧口三百里，磧口西至回鶻牙帳一千五百里。」又《寰宇記》一九九點愛斯目云：「從天德軍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北三百里鷓鴣泉，西北回鶻牙帳一千五百里。」所記實為一道，則鷓鴣泉即在磧口也。《新唐書·地理志》豐州目，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鷓鴣泉，亦其證。又《新唐書》四三下《地理志》錄賈耽入四夷七道，其四為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亦記鷓鴣泉為西北通回鶻兩道之總道口，其地去中受降城五百八十里，在磧南十里，由此通回鶻兩道之里程，亦皆為一千五百里，故《新志》之鷓鴣泉亦即西受降城北三百里之鷓鴣泉無疑。中唐時代李益在西受降城蓋頗久，其詩四見鷓鴣泉。如《度破訥沙》云：「破訥沙頭雁正飛，鷓鴣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暖川》云：「胡風凍合鷓鴣泉，牧馬千羣逐暖川」是也。又《鹽州過胡兒飲馬泉》詩，一作《過五原胡兒飲馬泉》。注云：「鷓鴣泉在豐州城北，胡人飲馬於此。」西城只在豐州西北八十里。李益諸詩所詠亦即磧道口之鷓鴣泉無疑。蓋此為一大泉，故胡人以此為聚集飲馬之地，因即為兩道之口也。今檢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第三冊《綏遠地形圖》與《人文圖》，狼山山脈西北有貢噶泉（Kungar Bulak），泉北有西蘭河（Silan）東流入一小湖。ONC F-8⁵雖無此兩地名，但

⁴ 《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刊《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1974。

⁵ ONC即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之縮寫。

東經 106°10′，北緯 41°45′ 地區為水澤地帶，其北有山，海拔 4739 呎，由山而東有長城遺跡，疑鵲鵲泉即今貢噶泉地區也。

鵲鵲泉為回紇道口，而最接近之城鎮為西受降城，故唐、回貿易常以西城為互市場地；其他邊疆民族亦有於此互市者。

《舊》一九四上《突厥傳》：

「開元……十五年，小殺（毗伽可汗）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並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錄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參看《冊府》九九九互市條）

按《新》五〇《兵志》云：「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即指開元十五年事而言，並述其對於馬牧之影響也。西受降城隸屬於朔方軍，此文可指西城一地而言，然亦不能排除兼指朔方軍城靈武而言之可能性。

又《唐會要》七二馬條云：

「天寶六載，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十匹，今於西受降城使納之。」

按《冊府》九七一作「令西受降城使印而納之。」同書同卷又書此年「四月，突厥九姓獻馬一百五十匹，堅昆獻馬九十八匹。」不知所納處。

雲中、單于府地區，為塞北漠南最肥沃地區，北方少數民族渡積南徙者常以此為中心根據地，故其地與中國北方重鎮之太原關係尤切，大隊行旅皆直接往來。如北魏初期踰漠而南都定襄之盛樂，道武帝因之南取并州，即取此道。隋世突厥勢衰，南居大利城，煬帝北巡榆林（即唐勝州，今托克托西），至其部落，亦取此道。

《魏書》二《太祖紀》：皇始元年八月「乙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并州平。」按時魏都雲中之盛樂，馬邑即唐之朔州，句注即朔州東南之雁門關，陽曲在并州北，皆詳下文。是此行即取此道。隋煬帝於大業三年四年兩度北巡河套地區。《通鑑》一八〇大業三年，紀其北巡路線，由并州過雁門，至馬邑，駕頓榆林郡，又幸啓民可汗帳。雁門即代州，馬邑即朔州，榆林即勝州（今托克托之河西）。是亦取此路也。

至於隋及唐代前期用兵突厥，更常見出此道，且常以此道為中軍主線。

《通鑑》書隋代及唐代前期數次北伐突厥事云：

開皇三年，衛王爽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爽親督李充等出朔州道，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大破之。（卷一七五）

開皇十九年，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卷一七八）

開皇二十年，楊素出靈武道，史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出塞至大斤山。（卷一七九）

貞觀三年，詔數道擊突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四年正月，靖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進破頡利於陰山。又與李世勣會兵於白道。（卷一九三）

調露元年十一月，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督豐州、幽州，三路並進，明年春，行儉行軍經朔州至單于府，大破突厥於黑山。餘黨走保狼山。（卷二〇二）

按白道在單于都護府正北，今歸綏北數十里，有白道梁。貞觀四年之定襄，爲定襄古城，即後魏之雲中，詳胡《注》引宋祁、宋白說。黑山在中受降城東北八十里，見胡注。觀此諸史事，朔州北出道爲一重要軍道，且常爲數道並出之中軍路線；蓋敵人入侵多由白道、陰山，即北河以北諸磧口也。

安史之亂，回紇登里可汗將兵入援，取道三城，經忻州至太原。其後唐與回紇國交較睦，罕見用兵，而通使往來，尤見此道爲兩國交通之最主要幹線。按長安至回紇逕捷之道，爲取靈武路（今靈武縣西南十里）或夏州路（今橫山縣西百里長城外之白城子），而東取太原府路最爲迂遠。然貿易通使，在較早時期，固見有取靈武路者；但盛唐以後，南北交往，如遣使，如貢、遺，如公主和蕃，例取太原路，即由長安東北行繞經河中府（今永濟縣）、太原府、忻、代、朔州，至單于府，即振武軍出塞，或更西至高關出塞也。中國防禦即以振武爲前線基地，西控天德軍、三受降城，而太原又爲振武之支援基地。故至晚唐，此道仍維持驛道規制，三城地帶有所經營，或遠自太原轉餉供應之。

《舊》一九五《回紇傳》，安史之亂，肅宗賞回紇之功，每歲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使彼自取。又宣宗《遣使冊回鶻可汗詔》（《全唐文》八〇），「朕……爰命使者將遠撫之。……軺車甫至於靈武。蕃使已及於塞垣。」朔方軍即靈武，此爲唐代後期，取道捷徑靈武極稀見之兩例。至於取道太原，則極常見，茲條述史證以明之。

《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同書二二三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可見太原爲回紇往來之主線。此猶可謂回紇用兵目標在洛陽也。下文所列三類史事，皆以京師長安爲目標或出發點。

唐使入蕃 《舊》一二七《源休傳》，「奉使回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回紇突董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方遣。」及還，「將至

太原」云云。是休使回紇，去回皆經太原及振武軍。又《通鑑》二四六，會昌元年，「回紇烏介可汗引兵……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求冊命。」二年，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河東即太原，是此次出使亦取此道也。

回紇使入唐 《通鑑》所記回紇遣使或入貢路線之可知者有下列各條：

大曆十三年三月，回紇使還，過河中。（卷二二五）

建中元年八月，回紇使者董突等自京師歸國，至振武，橫暴無厭，振武留後張光晟殺九百餘人。（卷二二六）

貞元十二年八月，「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卷二三五）

太和四年，「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大關牙門，受其禮謁。」（卷二四四）

太和七年，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回鶻使者李暢入貢。」（同上）

觀此諸條，多經太原。云過河中、振武者，雖有取道慈隰石嵐之可能，然最大可能仍取太原道，殆可斷言。下述回紇迎公主使臣亦此道。

公主和蕃 《通鑑》二一〇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乙未，「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會上傳位，婚竟不成。」《考異》引《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今并州長史薛訥發兵於汾州迎太子，幽州都督裴懷古發兵赴黑山道，朔方總管解琬發兵赴單于道。⁶此事雖未果行，然足見其擬議中之降蕃路線，乃取汾、并西北至單于府出黑山至突厥也。又《唐會要》六和蕃公主雜錄條，貞元四年，回紇可汗「使其宰相等……及其妹骨吐祿毗伽公主……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回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於鴻臚寺。」（同書九八回紇條及《舊》一九五本傳同。）《通鑑》二二三貞元四年，「時回紇之馭逆公主者在振武。」即此一事。是亦見蕃使入朝，公主出蕃，皆取太原、朔州、單于府道也。又《新》二一七《回鶻傳》，穆宗時，可汗請婚，許之，遣使來逆女，「部槩二千人，納馬二萬。……詔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留太原。」此亦見取太原道。復考雍陶有《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詩（《全唐詩》八函六冊），按關在汾州。是此公主入蕃亦取太原道無疑。蓋皆由太原西北經朔州單于府耳。

以上所考，皆見單于府以南之路程。然少數史料已見道經黑山、天德軍、三受降城。復考《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月「壬辰，振武奏回紇千騎至鷓鴣泉。」

⁶ 溫公《考異》以他書不載此事，不足信，故不採。岑仲勉先生以為可能有此擬議；嗣和親不成，事亦停頓，故他書從畧耳。說見《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太子送金山公主條。

《新》二一七上《回紇傳》，元和中，「可汗以三千騎至鷓鴣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軍備虜。」又《新》二一八《沙陀傳》李國昌節，大中時，回鶻「寇天德，乃徙節振武。」此皆見對回紇防禦線，以振武為基地，遠控黑山、天德軍至通回紇道口之鷓鴣泉也。振武又以太原為支援基地，故振武以西有所經營，或由太原遠為供應，如嚴郢《奏五城舊屯兵募倉儲等疏》云，「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全唐文》三七二）即其一例。又《新》一七一《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寇……牙五原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選沙陀（略）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朔州），且登振武城，……穴城夜出……直擣烏介帳。」是後期偶有用兵，亦以太原為基地也。

唐末之置驛：太原之北有烏城驛、三交驛，中葉善陽嶺有善陽館，皆詳後文。李德裕《條疏邊上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五），「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為其設計，今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則晚唐時代，雁門以北至振武軍或更西至河上三城仍置驛也。

蓋突厥、回紇入長安，取靈州道、夏州道，雖較近捷，然原、慶、鄜、延以北，或屬半沙漠地帶，或為橫山所阻隔；靈、夏以北，更屬荒漠，人煙稀少，供給困難。而太原道，路既較平，且沿途富庶，惟朔州以北乃較荒落耳，故唐與突厥之交通以此道為主。觀先天中金山公主和蕃擬議中之行程可知。逮中葉以後，吐蕃兵據原州，侵逼靈、鹽；靈、夏兩路略近荒廢，唐、回交通更唯太原一道可循矣。交通既以此道為主，軍事防禦因亦增重，故以振武軍為北河諸軍城之支援基地，太原府又為振武軍之支援基地，故《舊·劉沔傳》云：「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也。

今就此道之詳細行程考述如次：太原府北行，有烏城驛、秦城驛。

《舊》一九下《僖宗紀》，乾符六年十一月，以代北制置等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由代州赴任。「兩都虞候張鏐、郭勣迎於烏城驛，並殺之。」明年廣明元年，沙陀踰鴈門關逼忻州；二月進逼太原，陷太谷；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分兵拒之於秦城驛，為沙陀所敗。」《通鑑》二五三，略同。但云，「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則烏城驛必在晉陽北行道上，秦城驛縱不在此道上，亦必在道東不遠。

有虎北口，在汾水之北。

《通鑑》二八〇晉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辛丑……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敬瑄出北門，見契丹主。」又云「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云云。是道上有虎北口，在汾水之北。

府北十五里有古城。又北十五里或稍遠至三交驛；有三交寨，蓋在驛北。宋平北徙漢，

并州治此。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云：

「五臺縣向西南行卅里過胡陶河，到建安寺宿，……西南行卅里到忻州定襄縣七巖寺，……西南行卅里許到胡村……行卅里許到采村，……行卅五里到名〔石〕嶺鎮南關頭，……行廿里許到大千普通院，……行廿五里至蹋地庄，……行廿五里到白楊普通院，……更行十五里到三交驛歇，次入定覺寺庄，見水碾，名為三交碾，更行十五里到古城普通院，……行十五里到太原府。」

按五台、定襄皆即今縣。檢《統志》忻州卷山川目，七巖山在定襄縣東南十八里。由此西南行約近一百里至名嶺鎮，鎮南行約一百三十里至太原府，則此名嶺鎮即石嶺鎮之形譌無疑。此述石嶺至太原府之行程所經甚詳，可據書古城與三交驛。《寰宇記》四〇并州，「太平興國四年平晉，移州於三交寨，陽曲縣界。」《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并州，云「移州治三交。」按宋以陽曲為郭下縣，是三交寨必相近，與三交驛亦不相遠。《一統志》太原府卷古蹟目，三交城在陽曲縣北十五里，似稍遠。

又按三交口，宋初極重視為軍事要地。《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檢同書二五八《潘美傳》，是年征太原，美為北路都招討，平太原，繼征范陽。「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美嘗巡撫至代州」云云。又卷二七二《楊業傳》，「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合觀潘美事，此即陽曲之三交口；非代州別有其地也。

又北至陽曲縣，治木井城（今縣），去太原府約七十里。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三年，回紇寇太原；河東大將逆戰，遇虜於陽曲。檢《元和志》一三太原府，治太原、晉陽兩縣，陽曲縣理木井城南至府七十里。而《寰宇記》四〇并州，治陽曲縣。平晉縣在州南三十里。又云「皇朝平僞漢，其太原城中晉陽、太原二縣並廢毀置新城於城北，改曰平晉縣。」則平晉新城與舊府城不相遠。按唐陽曲縣一般皆以為即今縣所在，唐晉陽太原縣即今晉源縣（舊名太原縣），相距不應有七十里。檢《一統志》，太原府陽曲縣北至忻州界一百十里，忻州南至陽曲縣界四十里，是陽曲北至忻州一百五十里。按唐代太原府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則陽曲至府至多不過四十里。然以石嶺鎮在陽曲縣北七十里論之，則陽曲正當在太原府北七十里。或元和時代縣治本與宋以後不同歟？今姑據《元和志》書之。

又北行經百井凡七十里至石嶺鎮。鎮在嶺南，隸陽曲縣。嶺上或踰嶺置關（今關）隸忻州定襄縣。石嶺為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亂後，且置軍以鎮之。

百井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三年，回紇入寇，敗河東軍於陽曲。十四年紀稱

爲「百井之敗」，是在陽曲縣。又二五五，廣明元年二月「時沙陀已還代北。(康)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追之；壬戌，至百井軍變，還趣晉陽。」又二五四，中和元年，李克用北還，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又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具見百井爲太原以北之軍事要地。廣明元年條胡《注》「百井鎮在太原陽曲縣。」大曆十四年條胡《注》，「按《東都事略·張齊賢傳》百井在并州城北四十里。宋朝徙并州城於陽曲縣。」是在陽曲之北四十里。檢《九域志》四作百井寨。石嶺鎮、關、軍《舊》六一《竇靜傳》，武德初，爲并州大總管府長史。「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郵寨。從之。」《新》二一五上《突厥傳》，武德八年，頡利寇代州，使張瑾兵屯石嶺。「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張瑾事，《通鑑》一九一，同。又《通鑑》二〇七，長安二年三月，突厥破石嶺，寇并州。又二二〇，乾元元年，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充石嶺軍使。又《舊》一九下《僖宗紀》，乾符六年十一月，以「河東行軍司馬雁門代北制置等使石嶺鎮北兵馬代北軍等使康傳圭」爲河東節度使。《舊五代史》二五《唐書·武皇紀》，武皇率諸部萬人趨雁門，將入援京師，「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嶺關，」以阻之。（《新唐書·沙陀傳》略同。）據此諸條，石嶺爲太原以北之軍事險隘可知，安史亂後置鎮，置軍，置關。《新唐志》，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寰宇記》四二定襄縣條，「石嶺閱甚險固。」《元和志》一三太原府陽曲縣，「石嶺鎮在縣東北七十里。」《寰宇記》四〇，同。蓋嶺爲太原府陽曲縣與忻州定襄縣之分界處，鎮在嶺之南，關在嶺之北。前引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自石嶺鎮至三交驛約近一百里，又南至太原府三十里或三十餘里。與《元和志》所記太原北至陽曲七十里，又東北七十里至石嶺鎮之和略相合。又《武經總要前集》一七，石嶺關在忻州南三十里。按忻州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是里距亦合；惟鎮在嶺南，關在嶺北，故有十里之差耳。《武經總要》又稱石嶺關「山勢回抱，號爲險阻，路可行單車，舊有關城控扼。慶歷中，關南削山爲城。」此見其形勢，且明關在嶺北，然石嶺鎮亦有南關之名，故圓仁云南關頭也。檢《一統志》太原府卷關隘目，「石嶺關巡司在陽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北去忻州四十里，爲并、代、雲、朔要衝，勢甚險固。」南北里距皆稍盈，實卽一地。

由嶺北行約四十里至忻州治所秀容縣（今忻縣），又北五十里至忻口（今地），滹沱水由北南流歷此谷口，忻川水自西來會於口南，兩山夾峙，甚爲險固。

石嶺鎮去陽曲七十里，去太原府約一百四十里，推知鎮北至忻州之里數。前引《武經總要》關在州南三十里，亦合。

《通鑑》一八二，大業十一年，始畢可汗圖煬帝於雁門（卽代州），會諸郡援兵至忻口，始畢解圍去。《舊五代史》九九《漢書·高祖紀》上，爲河東節度；契丹

寇入雁門，帝破之於忻口。《通鑑》二九二周顯德元年，契丹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符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宋史》二五五《張永德傳》，周世宗進攻太原，永德「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此見忻口爲雁門以南之要隘。《通鑑》胡《注》：「《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杜佑曰：隋置忻州，因忻口爲名。」檢《寰宇記》四二忻州秀容縣條引《水經注》：「滹沱南歷忻中口，俯會忻川水，水出西管涔東山。」（今本鄭《注》已佚）《一統志》忻州卷關隘目，「忻口在州北五十五里，兩山相夾，滹沱水經其中。《魏土地記》漢高祖出平城之圍，還軍至此，六軍忻然因名。山之西，舊有忻口城，相傳卽漢高祖所築。」檢《元和志》一四代州，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寰宇記》四九譌爲十五里。）《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崞縣「南至忻州忻口砦六十里。」又云忻口砦「居兩山之口，最爲險要，南至忻州五十里。」按代、忻間相去一百六十里，里距正合。

口北卽唐林縣（今原平南）在沙河北二里，東濱滹沱水；又北至崞縣（今縣），亦東濱滹沱水，去忻口六十里。

《舊》六九《劉世讓傳》，高祖問備邊策。世讓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請於崞城置一智勇將，數出奇兵芟踐其禾稼，馬邑不足圖。又《通鑑》一九〇，武德六年，頡利帥眾攻馬邑，上命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又二五三，乾符五年，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此諸條具見崞縣當軍道。檢《元和志》一四代州，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唐林縣東北至州一百一十里，滹沱水在縣東，沙河在縣南二里。《寰宇記》四九，略同，惟無沙河一條。按前引《武經總要前集》，崞縣西南至忻口砦六十里，則唐林縣當與忻口極相近。《武經總要》一七忻州忻口砦，「城北唐林縣。」意亦極近。檢《一統志》代州卷古蹟目，引《新志》，唐林故城在崞縣南四十里。又引《括地志》，原平故城在崞縣南三十五里。按今圖有原平鎮，則唐林蓋在口北約二十里原平鎮之南。

又東北五十里至代州治所雁門縣（今代縣），南臨滹沱水，卽古上館城。州南二十里有東陁關，似亦在此道上。

方向里距，見《元和志》一四。《寰宇記》四九代州雁門縣條，滹沱水在縣南。又代州條，後魏明帝移雁門郡置廣武東古上館城內，卽今府城是也。

《通典》一七九代州，「郡南二十里有東陁關，甚險固。」《寰宇記》四九雁門縣，同。考《舊》一二〇《郭子儀傳》，舉兵出單于府，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新》傳同。《通鑑》二一七，天寶十四年紀，作東陁關。胡《注》，「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秀巖，子儀旣破秀巖，始開關。」則關似在道上。

代州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西陁山，爲滹沱、桑乾兩河分水嶺；古稱勾注塞，與盧龍、飛狐

並稱為天下之阻分隔內外者。開皇長城自西阻東經此山。其山東西高巖峭拔，中路盤旋崎嶇，然為北方敵軍南侵之最主要險隘道口。唐於絕頂置雁門關，以斷寇道。北宋置雁門、西陁兩砦，東西分列，極相近。谷道十餘，多通車騎，蓋視唐更開關矣。然西陁與雁門之為兩陁道，或實不自北宋始。

《呂氏春秋》一三《有始篇》，山有九塞，句注為其一。高《注》，在雁門。又《淮南子》四《地形訓》，與《呂覽》同。高《注》：「在雁門陰館句注也。」此為句注險塞之較早見者。《隋書·地理志》，雁門郡雁門縣，有關官。《新唐志》，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豈隋、唐始置關耶？東陁關，見前。《通典》一七九代州雁門縣，「有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元和志》一四，代州目「今按句注在州西北三十五里，雁門縣界西陁山。」《寰宇記》四九代州目，同，云據《河東記》。又《元和志》代州雁門縣，「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寰宇記》代州雁門縣條云：「《水經注》云：雁門郡北對句注，東陁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云云。是《元和志》亦出鄴《注》，惟鄴《注》溇沱水篇今已佚。《紀要》四〇代州，句注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雁門山在州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岡隴相接，故句注亦兼雁門之稱。」則本為兩山而相接。《一統志》代州卷關隘目引《州志》，「關舊在雁門山上，東西山巖峭拔，中路盤旋崎嶇，唐於絕頂置關。元時關廢。明初移今所……形勢雄勝，即句注故道也。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為山西之屏垣。」形勢可見。然經歷代開關，⁷ 谷徑已不只一途。《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之東繞東北至西北，建砦十三，其雁門砦「西至西隴〔陁〕，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濶五十步，一纜通車騎。」西隴〔陁〕砦「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隴〔陁〕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鎮，谷路十二，十通車騎，二通行人。」可見谷道甚多，守備亦不易也。

前引《紀要》，雁門與句注兩山岡隴相接，故得兼稱。據《總要》所記，則北宋前期，西陁、雁門亦為兩陁，分別置砦。復考《宋史》二七二《楊業傳》云：

「帝（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陁〕而出，由小陁至雁門北口，南面背擊之，契丹大敗。」

此尤為相近兩陁口之明證。時在太宗初年，足證其為兩陁不自宋始。

又《隋書·地理志》雁門郡雁門縣有長城。楊氏《考證》，「在代州北三十里，西自雁門關，東至馬蘭口。」就方位里距論之，關正當在隋長城之口。

雁門關既為南北大防，故在軍事上，極見重要性。《通鑑》一八〇隋仁壽四年，

⁷ 如《漢書·武帝紀》元光五年，發卒治雁門阻險。

漢王諒反於晉陽，兵圍代州。「詔朔州刺史楊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陁」救之。同書二〇二永隆元年，裴行儉由定襄(代州)出朔州至單于府，大敗突厥於黑山。明年又書「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陁口，多縱反間」云云，以弱突厥。此見代、朔間之要道經雁門關。又二四六會昌二年，回鶻烏介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羗渾，又屯杷頭烽北；」遣使「借天德城，詔不許。」以河東節度劉沔兼招撫回鶻使，「令沔屯雁門關」以備之。尤見此關隘之重要。其餘前代史事，《紀要》四〇山西名山條徵之已詳，茲不贅。《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契丹主出兵援石敬瑭，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觀，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此正見雁門為南北之阻。《舊五代史》七五《晉高祖紀》，請「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契丹主壽，亦正以雁門為南北之大防，分隔內外者也。

勾注陁南口之南二十里有漢廣武故城，即高祖械繫婁敬處。陁之北口有下館城，即陰館故城。

漢廣武故城，見《寰宇記》四九雁門縣目。下館城，見《通鑑》一八八武德三年紀胡《注》。《寰宇記》五一朔州鄆陽縣有「陰館城，今名下館城。」《一統志》朔平府卷古蹟目，陰館故城，漢縣。引《舊志》，「在朔州東南八十里。」按朔州去陁正八十里，詳下文。則當即陁之北口，與胡《注》合。

出西陁、雁門關向西微北行八十里至朔州治所鄆陽縣(今朔縣)，即古馬邑城也。南臨馬邑川，為陁北桑乾河上游之小盆地。農產較豐，故南北用兵往往以此為中頓基地。

朔州東南至代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一四朔州鄆陽縣，「勾注山在縣東八十里。」《寰宇記》五一作東南八十里。前考西陁山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里程正合。《元和志》云，《史記》曰，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即今州理。「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因依而築，城乃不崩，故名。」按此出《水經注》一三灤水注引《搜神記》。且鄆《注》述灤水在此地區有三源。其一馬邑川，「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東逕馬邑縣故城南。」此源居中最長。其北一源在朔州北山，所謂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其南一源謂之灤水，出雁門關北。檢 ONC G-9，朔縣地區，地形平行，河流交錯，宜其為陁北之軍政中心。其例之可見者，如李靖出馬邑大敗突厥，詳下文惡陽嶺條。石雄發馬邑徑趨回紇烏介可汗之牙，見《舊書》一六一《石雄傳》。又如《舊》六九《劉世驤傳》，「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驤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中路耳。……請於崞城置一智勇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此見馬邑為北方敵人入寇之根據地，而所恃在能就地給養也。

西陁之西七十里又有土壇，當東魏武定長城之東端，亦為唐、宋時代代州西北通朔州之

一道口。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代、忻十三砦，西經砦「西至土壇七十里。」土壇砦「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三，皆通行入。」《九域志》，代州崞縣有土壇寨。作壇為正。考《魏書》一二《孝靜紀》，武定元年，「齊武獻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壇。」按寰州在今朔縣東。

又崞縣之西三十里有揚武谷，亦為北通雁門關之一路。

《舊》一九五《回紇傳》，大曆十三年，寇太原，敗河東軍於陽曲；代州都督張光晟破之於羊武谷。《通鑑》二二五，同。胡《注》引《九域志》，代州崞縣有陽武寨。同書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辛丑，契丹主至晉陽。」《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考《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西境有揚武砦。「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入。」檢《一統志》代州卷關隘目，陽武谷堡「在崞縣西三十里陽武山谷中，西去蘆板寨堡四十里，（《武經總要》作樓板砦，又四作三。）南去陽武村三十里，宋故砦也，元建為關。」檢今圖，崞縣西有陽武地名是也。復考《舊五代史》七五《晉高祖紀》，契丹主此次用兵，實「自雁門而南。」據《遼史》三《太宗紀》，八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則仍由雁門南下取揚武谷路也。

又崞縣西北八十里有石門關，嘗亦為北出朔州之一道，但不經雁門關。意者由忻口西北出揚武谷、石門關，亦至朔州，近代汽車道蓋即略循此故道而行歟？

《寰宇記》四九代州崞縣，「石門關在縣西北八十里。」《新唐志》亦云崞縣有石門關。《通鑑》二八〇天福元年紀稱「雁門諸路」。胡《注》云「雁門有東陁、西陁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度其地望，在雁門關西南甚遠，而北對朔州，蓋直通朔州者。今圖有汽車道，由忻口西北經陽武、寧武，至朔縣，疑因故道，而石門即在此道中歟？惟乏實證。

朔州西北行三百五十里至單于都護府治所金河縣，置振武軍。其地在金河（今大黑河）之南，雲中川（一名白道川）中，約在今歸綏城（今圖呼和浩特，東經111°40′，北緯40°50′）西南約三四十里。途中次第經善陽嶺、惡陽嶺。善陽嶺南去朔州約二百一十里，北去單于府約一百四十里，約在今和林格爾西南大紅城地區（東經111°45′，北緯40°10′）。隋大業三年，「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今紅河上源？）。」今緣胡山（紅河口之北）以東，和林格爾之南，紅河之北迤東至涼城、豐鎮尚有遺蹟。善陽嶺即此段長城之一嶺口耳。惡陽嶺又在善陽北長城之外。唐世置善陽關、善陽館，武元衡有詩，蓋即在善陽嶺；以其為太原；馬邑西北出之主道，又當長城嶺口，故關館並置也。

朔州至單于府里數，見前文。置軍及治所金河縣，皆見《元和志》四。單于府今

地，已詳《唐代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⁸ 改訂本。

白道川 《舊》一九九下《鐵勒傳》，朝廷立李思摩為可汗，「處其部眾於漠南」。薛延陀夷男不悅。貞觀十五年，夷男「勒兵二十萬，屯白道川，據鄯陽嶺以擊思摩。」「詔英國公李勣……踰白道川至青山」擊之。《通鑑》一九六貞觀十五年紀，略同。云思摩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舊》三《太宗紀》下，書此事云「薛延陀度漠屯於白道州。」又《通鑑》一七六，陳至德三年，突厥沙鉢略畏達頭、契丹之逼，「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據此諸條，白道川在漠南，善陽嶺外，即今黑河流域。《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陰山道條，引《冀州圖》云：

「雲中周迴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漠長城百里，即白道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獲，每至七月乃熟〔熟〕……」

此段述雲中白道川之平行良沃情形，即今歸綏古雲中、古定襄之地區無疑。《通鑑》一九三貞觀四年紀，胡《注》引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是也。蓋地當陰山白道口之南，故有白道川之名。後雲州雲中之名移於今大同，樂史不察，遂張冠李戴，將此段材料亦移至大同。《寰宇記》此類情形隨處可見，不足為異。復考《魏書》二四《燕鳳傳》，鳳對苻堅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此時魏都盛樂，建雲中宮；所謂雲中川亦即上述之白道川，但以漢雲中郡、魏雲中宮標名耳。

長城《隋書》三場帝紀，大業三年北巡，六月次榆林郡。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通鑑》一八〇、一八一書此兩條。檢《隋志》，定襄郡治大利縣，「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通典》一七九單于府金河縣「有長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又朔州善陽縣，「有紫河發源於此。」按金河即今歸綏南之大黑河，無異說。然其源去唐之善陽縣(今朔縣)太遠，絕不在善陽境；發源於善陽境者惟鄭《注》之中陵水，今之紅河耳。《一統志》歸化城卷山川目，謂紫河即古中陵水。王國良《中國長城沿革考》(台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本，民國60年)，頁56引《明史》(卷四一)《地理志》，大同縣「西北有金河，又有紫河，皆流入大河。」因斷云紫河即今紅河，是也。⁹ 地在北

⁸ 《唐代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刊《新亞學報》第十卷第一期下冊，1973。

⁹ 觀 ONC F-8，紫河仍有即為今黑河、岸水河上源之可能。

疆，《通典》誤合為一水耳。是此次所築**長城**，蓋西自今托克托地區，（隋榆林郡縣在黃河東流折而南流處。）東至今**紅河上游**，即在雲中故城、定襄故城之南。《通鑑》一九六貞觀十五年，突厥俟**利苾**可汗率部落「建牙於故定襄城。」奏請「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徙〕家屬入長城。」旋果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尤為**長城**在定襄故城以南之強證，考《綏乘》七《要隘考》云：

「古長城在歸綏境者，故蹟久湮。其南**境城**址，起清水河之北，緣胡山以東，跨和林格爾之南，直抵涼城、豐鎮，乃隋大業所築也。與明代外邊，分山前山後，俗名二道邊牆。其在清水河之南，偏關之北者，為明代大邊，今亦久廢。」

按緣胡山早見於《漢志》、酈《注》。《漢地志》雲中郡棧陵縣，「緣胡山在西北。」《河水注》「河水南入棧陵縣西北緣胡山……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下文述河會樹頽水，樹頽水**上游**名中陵水，即今紅河也。則山在今紅河口之北。《綏乘》五《山川考》上，**和林格爾**之山，「循紅河而抵黃河東岸有緣胡山。」古今地望不異。而《綏乘》所指之大業長城則建於紅河之北也。此與前列史證極相契合。其為隋唐長城應可無疑。

善陽嶺、惡陽嶺 前於白道川條引《舊》一九九下《鐵勒傳》，「期廷立李思摩為可汗，處其部眾於漠南，」薛延陀夷男不悅。貞觀十五年，「勒兵二十萬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詔英國公李勣……踰白道川至青山」擊之。《通鑑》一九六貞觀十五年紀略同；云突厥，「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胡《注》：「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是也；而四年紀胡《注》又云：「善陽嶺在白道川南。」上文考證，白道川即雲中定襄故地之金河（今黑河）流域小平原。故此兩注，一謂在善陽縣北，一謂在白道川南，實相吻合，無誤。然所指太廣泛，地望不明。檢《寰宇記》三八振武軍金河縣，「善陽嶺在縣北一百四十里，秦長城枕之。」此條方位顯誤，疑「北」當作「南」。考《通鑑》二三九元和九年，振武軍亂，詔「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鏐以兵二千納之。」「正月甲戌，王鏐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胡《注》「善羊當作善陽。」是。尤為善陽嶺在單于府（與故定襄城相近）以南之強證，然去單于府已不過一日程。急行軍一日程正當有一百四十里，足證《寰宇記》里數可信，為一條寶貴史料，惟謂「南」為「北」耳。善陽嶺在單于府南一百四十里，即當在朔州西北二百一十里。觀今日地圖。正當在紅河地帶。其為長城之一嶺口殆可斷言。《寰宇記》云「秦長城枕之」，實即前考之紅河北之隋長城耳。然此嶺究在紅河之上游抑在下游抑在下游，仍當進一步研討。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唐代太原北塞交通圖



圖例

- 唐代府州治所
- ▲ 節度使治所
- 唐代縣治或軍治
- 唐代鎮戍或古城
- △ 唐代館驛
- 唐代關津渡或道口
- ⊥ 唐代山嶺峽谷
- 唐代其他小地點
- 現代縣治
- +
- 唐代驛道或重要幹道
- 唐代其他大道或側置驛
- 唐代普通道路
- 黑字不加括弧()者 古地名
- 黑字加括弧()者 今地名或其他說明

底圖參合國防研究院出版中華民國地圖集
第三冊 D17 至 D 21 圖 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F-8,9,G-9 及禹貢學
會出版後套區域總圖製成。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檢《綏乘》四《疆域考》下，歸綏縣道徑條述四達之道云：「南經西大河，至和林格爾界上土城，古定襄道也，為入殺虎口舊道。東南經東大河至涼城界西溝門，古參合陁也，為入殺虎口新道。」是歸綏南行有東西兩道，東為古參合陁道，西為古定襄道。近代以來，以殺虎口為塞道總會，故云皆入殺虎口。再觀《國防研究院地圖》，今朔縣西北至歸綏有東西兩道，在平魯分途。東道北經右玉出殺虎口長城，經涼城。西道西由敗虎堡出長城，經清水河縣城，及和林格爾城。唐道以西道之可能性較大，所謂定襄道也。前引《通鑑》記元和九年事，張煦由夏、綏北來，必取麟州(今神木)道，其渡河處當在君子津(清水河口之北)或今河曲偏關地區。其會師地點應在今清水河縣地區，決不會東在殺虎口地區，殆可斷言。此即唐道近乎今日之西道之明證。復考《魏書》三《太宗紀》，永興三年八月，詔尉古真統兵五千鎮西境太洛城。五年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七月「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踰七嶺山，田於善無川。」《河水注》有太羅水引《十三州志》曰：「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觀鄜《注》所述，此城當在今清水河縣之南。檢《國防研究院地圖》清水河縣西南至黃河間，長城之北有大羅地名，必即其地。大落即太洛，亦即太羅。則大落城為軍事要地，有通道至善無也。善無在今右玉縣南。檢今圖，大羅有道東通清水河，又東入長城經敗虎堡至平魯。此即魏帝由大洛城至善無之舊道矣。而魏帝此行實由雲中舊宮之大室向南行至大洛城即大羅城，則所行亦是今之西道，更足為唐行西道之先例。

鄜陽嶺既在紅河流域，而所行道又為西道，則此嶺當在紅河下游地帶。然則其地蓋在今紅河之北(隋唐長城在河北)和林格爾城之南歟？若準以地圖里距，當在和林格爾之西南，大紅城地區，北去單于府金河縣正約當有一百四十里也。

復考武元衡有《單于罷戰卻歸題善陽館詩》(《全唐詩》五函七冊《元衡集》二)云：「單于南去善陽關……。」則單于府南行道中有善陽關，置善陽館，當即在善陽嶺；蓋以其地當長城嶺口為要道，故置關且置館也。

善陽嶺之地望既定，再考惡陽嶺。《舊》六七《李靖傳》：貞觀初，「突厥諸部離叛，……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可汗……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潛懷猶豫，……靖……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頡利畏威先走，部眾……潰散。」《新》九三同傳略同。陰山之役，云自白道襲之。《通鑑》一九三貞觀四年，略同。胡《注》：「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又云：「《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啓民可汗者也，李靖所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引宋祁曰：「古定襄

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引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按靖所破為北定襄無可疑，地在長城以北，歸綏以南，與後所置單于府相近。惟惡陽嶺似惟此一見，而胡《注》與善陽嶺比而論之，惡陽在定襄城南，善陽在白道川南。城為點，川為面，其意惡陽地望在善陽之北。觀《李靖傳》書事，惡陽嶺必去朔州已甚遠，而去定襄古城則甚近，已在長城外，故謂「靖豈敢孤軍而至」也。胡《注》所云殆甚有據。

單于都護府、振武軍治所金河縣，在漢代定襄郡成樂縣，後魏故都盛樂城之北近處。唐初所置單于都護府，本不在此處，至玄宗時代始復置於此。天寶四年於府治置金河縣，因縣北金河（一名紫河，今黑河）受名。同時徙置振武軍於府城，管兵九千人，馬一千六百匹。中葉以後，吐蕃侵逼朔方，靈、鹽、夏、銀失於控御，振武一軍加節度銜，遂為唐代河套東北黃河內外地區之軍事控扼中心，亦為唐通回紇唯一幹道之中心樞紐。其地在塞外極罕見之平衍沃壤，稱為雲中川、白道川。宋祁稱「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誠非虛言。有此優良之地理條件，故能為歷代北疆之軍政重地也。

府、軍、縣之建置，及漢魏故地，皆見《元和志》四單于大都護府目，惟「單于都護府城」今本譌為「東受降城」，《考證》已言之。其今地及遷徙情形，皆詳《唐代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及《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¹⁰（皆改訂本）。

宋祁語見前引《通鑑》一九三貞觀四年紀胡《注》。

由單于府西南行約四十餘里至北魏雲中故宮，又西四十里至秦、漢雲中故城（今托克托城東北約二三十里），皆在金河即古芒干水（今黑河）之南，白渠水（今岸水河）之北。又西三十餘里至東受降城，在黃河北岸，近金河口（今托克托城西約十餘里）。中宗景龍二年張仁愿置，兼置振武軍。天寶四載，軍移單于府；東城如故，管兵七千人，馬一千七百匹。由城西南渡河八里至勝州治所榆林縣，故城今存，曰十二連城（在托克托城西南約二十二三里黃河西南灣內）。又由朔州西北經四百二十里亦至勝州，蓋亦中經善陽嶺歟？勝州向西微北三百里至中受降城，在黃河外拂雲堆神祠，約在今賈格爾旗西地區（昆都倫河口之西東經109°20'），亦景龍二年張仁愿置，管兵六千人，馬二千匹。開元二年移安北都護府治此。中城西北行二百里至天德軍，天寶末年置，在北河（今黃河故道五加河）東北岸去河五里，大同川（今流圖河？）西，約今烏蘭鄂博地區（東經108°30'，北緯41°20'）；又西南渡河（北河，今五加河）一百六十里至豐州治所九原縣，其地在西河之東一百三十五里，北河之南四十里，約今狼山縣或稍東（東經107.40'，北緯41°）；又西北八十里渡河，河外有西受降城，由天德軍直西行一百八十里亦至西城；城在北河（黃河故道，今五加河）西北岸（經緯度約數詳前），與中城、

¹⁰ 詳注3、注7。

東城同時置，管兵七千人，馬一千七百匹。其西北即高闕塞，為狼山之一谷口，乃戰國以來西北著名重要軍事隘道。西城西北出塞三百里至麟鵠泉（其地詳前），為通回紇道之磧口。並詳前文。

此段或前文已有考論，或詳拙作《唐代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考》、《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唐代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考》及《唐代長安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諸論文。¹¹ 惟諸文未涉勝朔間直線通路。按勝朔間直線交通路線里程，唐宋地書鮮記，惟《通典》一七三，勝州「東至河四十里，去馬邑四百二十里」一條。《寰宇記》三八勝州目，同。是必由勝州直東南行，不經單于府也。《寰宇記》又云勝州去雲州四百里。是亦不經單于府者。疑此道亦經善陽嶺歟？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¹¹ 《唐代長安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刊本學報第五卷第一期，1972。

The Route from T'ai Yüan Northwest to Chan-yu Tu-hu-fu and the Three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Tai Yüan had been the pivot of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a strategic post of North China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Its special status became even more obvious when it was made the Northern Capital by the T'a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powerful neighbor in the north was the Uigur whose capital was in what is today Kharabalgasun 黑城子 on the left bank of the Orkhon River 鄂爾渾河 in Outer Mongolia. The main communication route from the Uigur to T'ang China went from Kharabalgasun southeastward to P'i-t'i-ch'üan 鷓鴣泉, a distance of 1,500 *li*, then turned southward to Hsi Shou-hsiang-ch'eng 西受降城 (on the northwest bank of the Wu-chia River 五加河, the old course of the Yellow River) through Kao-ch'üeh 高闕 (lat. 41°20' N., long. 107°25' E.) for 300 *li*. From Hsi Shou-hsiang-ch'eng, it went straight southward to Ch'ang An by way of Ling-chou 靈州, the present Ling-wu 靈武, a total distance of 2,100 *li*; alternately it went eastward through Chan-yü Tu-hu-fu 單于都護府, 30-40 *li* southwest of the Huhehot City nowadays, and then turned southeast to Yen-men-kuan 雁門關, T'ai Yüan Fu, the present Chin-yüan 晉源, and finally southwestward to Ch'ang An, a distance of about 3,000 *li* altogether. And thus Ling-chou and T'ai Yüan were two key points in the main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Uigur. They were also two strategic post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T'ang Empire against the Uigurians and other northern barbarians. The route by way of Ling-chou was the shorter one. However, there are deserts in the north and the Heng Mountains 橫山 in the south and along the whole route, it was desolate and the population was scarce. By contrast, the route by way of T'ai Yüan was flat, and passed through more prosperous and populous areas. As a result, the T'ai Yüan route was already more flourishing than those of the Ling-Chou route even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fter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and Shih Ssu-ming, area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Ling-chou were constantly invaded by the Tibetians, and the route through T'ai Yüan became the only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Uigur. Diplomatic missions and traders used this rout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as well as examine and describe the conditions along the route from the area south of Kao-ch'üeh to T'ai Yüan. As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i Yüan and Ch'ang An, it had already been dealt with in another article in some detail.